



二十世纪全纪录

1941

周丽琼 主编

目 录

中国部分	1
世纪回眸	1
皖南事变	1
日军制造潘家峪惨案	11
治安强化运动	11
国民党设立上饶集中营	12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遇害	13
高会战取得胜利	14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举行	15
中国政府发表《对日宣战通告》	19
中共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 ..	19
“精兵简政”	20
中国化学家侯德榜首创“侯氏制碱法”	20
红色警报东方传	27
第一批美军抗日志愿人员前往中国	38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39
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	43
1941年六年制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草案	5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播	62
小资料	65
世界部分	72
世纪回眸	72
日苏中立条约签订	72
苏联卫国战争	73
惩治“海狼”之战	77
击沉 U-110 之战	89

德军兵败莫斯科	91
特殊的莫斯科红场阅兵式	95
苏军基辅防御战役严重失利	97
苏联近卫军诞生	104
莫斯科会战	111
珍珠港之战	122
希腊军队向轴心国投降	124
小资料.....	124

中国部分

世纪回眸

皖南事变

1月6日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在泾县境内茂林地区遭国民党军顾祝同所部上官云相指挥的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后,血战7昼夜,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在13日与上官云相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杀害。

早在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其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电到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指定地域,以此揭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序幕。11月9日,中国共产党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出“佳电”,拒理驳斥“皓电”的污蔑和无理要求,但为顾全抗战大局,仍答应在江南的新四军正规部队北移,不过须宽以期限。14日,国民党军拟定了集中第3、第5战区主力在“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第一步第3战区部队于1941年1月底前歼灭江南新四军,尔后转兵歼灭苏北新四军;第二步第5战区部队于1941年2月28日前歼灭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12月7日,蒋介石批准执行这个计划。8日,国民党又以何、白名义发出“齐电”,令黄河以南之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至河北,以此制造进攻借口。

蒋介石亦从后台跳到前台。他于9日令黄河以南之八路军、新四军北开，次日即令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江南新四军年底前若不北移，“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这时，国共两党关系急剧恶化，皖南的军事冲突已箭在弦上。

面对国民党的军事企图，毛泽东多次电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实为政委）项英，要皖南部队渡江北移，并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一切。12月26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电告新四军：自己想办法，下决心克服移动中的困难。“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12月下旬，顾祝同决定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7个师8万余人从东、南、西三面围堵皖南新四军。

1941年1月4日晚，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出发，拟经苏南向江北转移。1月6日，当部队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包围和拦击。新四军指战员被迫还击，经七昼夜血战，终因弹尽粮绝，处置失当，除2000余人分批突出重围外，其余近7000人或受伤被俘或壮烈牺牲。叶挺奉令与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项英、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暗害，袁国平在分散突围中牺牲。此即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由此达到顶点。

1月17日，国民党通过其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诬

称新四军“叛变”，宣布撤销其番号，将叶挺军长革职，“交军法审判”，并通缉副军长项英，妄图先声夺人。

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使中共领导人一度认为国共的全面破裂已经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已经完结，应当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展开全面反攻，但经过反复权衡，中共中央又改变了想法，认为时机不成熟，力量不允许，因而决定采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方针。1941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新四军失败的原因后指出：对于皖南事变，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像前年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那样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破裂，才能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20日，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全军整编为7个师另1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同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严词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还提出包括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制造皖南事变的祸首、释放叶挺、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撤退华中剿共军等善后办法十二条。新四军将领17人发表声讨亲日派通电，谴责亲日派行秦桧之志。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拒登军委会通令，还亲笔书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联在报上发表，揭露皖南事变真相。

全国军民纷纷集会与发表通电，声讨蒋介石的反共分裂和投降罪行。

皖南事变发生后的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

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正义的人们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又一次反共内战的愤怒和谴责，这也是皖南事变被称为“千古奇冤”的由来。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真相。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命令和发言人谈话。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于恢为政治部主任，重建新四军军部。谈话提出了严惩祸首、取消1月17日反动命令等12条解决皖南事变办法。周恩来在重庆除同国民党当局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外，并运用各种形式在各界人士中揭露和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和国际进步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政治上，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国内各小党派和中间势力对蒋介石已失去幻想；中共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在全国人民中的声望。在军事上，尽管新四军在皖南遭受局部失利，但是何应钦、白崇禧“皓电”、“齐电”限令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的阴谋化为泡影。而皖南事变后不久新四军军部的重建，使部队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蒋介石妄图通过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来达到取消新四军的阴谋也彻底破产。

对于皖南事变这样一个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国共两党关系史上重大事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党史、军史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之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历史的尘封不可能一一拂尽，因而，迄今为止，仍然留下许多待解难解之谜，尚需学术界继续不断的加以深入研究探讨。

新四军选择南下皖南事变前，皖南新四军各部北移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这就是向东、向南和向北：向北是由云岭、萧村、北贡里、土塘等皖南新四军各部驻地向北，经铜陵、繁昌之间的渡过长江至江北无为一带。这条路线基本上是敌占区。向东是由我军驻地向东开拔，由苏南北渡，其具体路线是，从驻地经泾县的马头镇、宣城县的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箐桥、水西地区，然后进入苏南之敌占区，从镇江附近渡江。这条路线所经之地是敌、顽的交错防区。向南是皖南新四军最后所选择的路线，这就是从驻地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郎溪，绕道苏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区，不仅行程最远，而且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沿途有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师。新四军最终所选择的路线是向南的路线。从皖南事变事后的结果来看，新四军所选择的北上路线与北上时间是最坏的。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也有人认为是在对向东、向北和向南路线作出比较后作出的在当时看来是最佳选择的路线。

有学者据此认为“部队最后确定的北移路线，并不失为一种有利选择，它并非是一条自投罗网的自杀路线。有谁能保证说由泾县往北在铜陵、繁昌间北渡，或向东去苏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无事或较少牺牲呢？”有人认为，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本性，鉴于国民党有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科，鉴于黄桥战役、皖南 1940 年秋季反扫荡、曹甸战役中新四军在作战中的杰出表现和实力的显现，蒋介石发动内战与同室操戈的事不可避免，但这种内战发生的具体地点、时间可以移易，但是，有人还认为，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现在的问题是，历史只具有一维性，逻辑推论毕竟代替不了历史事实。走向东和向北的路线无非有这样几种后果：全军覆没；遭遇（顽军或日军）阻击，有部分伤亡；顺利北移。如果走了其他的路线，该是哪一种结果，这是永远也无法揭开的谜——因为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永远只能是猜测。

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将其反共活动的重点由华北转向华中。1940 年 7 月 16 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內撤至黄河以北，并要八路军、新四军由 50 万人缩编为 10 万人。1940 年 9 月 19 日，毛泽东指示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內渡毕增援皖东为要。”10 月 8 日向皖南军部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一、军部移动到铜陵、繁昌三支队活动地区，准备在顽军进攻时渡江到皖北；二、如有可能，移到苏南

也可；三、如直接移皖北，即令江北四支队派兵到无为沿江接应。10月9日，刘少奇致电叶挺、项英，要军部从速北移，指出“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10月12日，毛泽东又再次致电耐心说服项英，说明北移理由，要皖南军部“绝对不要迟延。”10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尽快渡江，以速为好。10月25日，毛泽东又向项英等人转发了周恩来“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的意见。以后的11月15日、11月21日、11月24日、11月30日、12月14日、12月26日等日又反复催促项英尽快北移，或在情况有所变化、项英犹豫不决的情况下给予鼓励，或给予严厉的批评，其目的都是为了要项英北移，但对于党中央的指示，项英或直接拒绝之，或婉言拒绝之，直至1940年12月28日才召开新四军军分委会议，决定于1941年1月上旬北移，致使新四军被围而聚歼，使革命队伍遭受惨重损失。对于项英迟迟不率部北移的原因，有的分析是项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受到王明右倾错误的严重影响，抵制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强调皖南特殊等。有人认为，仅仅作这种分析是不够的，还要“研究历史的、现实(指当时的现实)的、国际的、国内的、个人的种种因素”，要“进入人物的心态”来进行研究。那么，项英当时的心态究竟如何？既未留下片纸只字，也不见有人听到项英的任何流露，尽管我们可以对之进行分析和揣测，但不能作为信史，项英其时最真实的心态恐怕这实在是永远也解不开的千古之谜了。

这是关系到新四军北上抗日为什么选择南下茂林的问题而遭到国民党部队围剿的问题。1940年4月3日，

毛泽东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问到：“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4月9日，项英收到毛泽东来电，当天立即回电，报告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说：“向南，为黄山、天目山、纯石山，人少粮缺；靠江，则须经过敌友之间，极不利；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会合。到苏南，地区不利，处在敌友夹击，地区狭小。只有在广德、宁国一带坚持，继续战斗。”可见，最后决定绕道的路线时，项英是作了遇到袭击时坚持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坚持战斗的准备的，并且主要是考虑了新四军各部队善于在山区地形进行作战的因素的。只不过在北上的实际过程中，由于他对蒋介石等的反动本性认识不足，应付突然袭击的准备不充分，故在皖南事变中遇到袭击时，还等不到我军到达广德、宁国一带就被围歼，连他本人也在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那么，项英为什么要率领皖南新四军部队向南而北上呢？这里的关键是：有人说项英有一个建立“第二延安”的想法，也有人认为与新四军大部分部队缺乏在国共合作抗日情况下对所谓“友军”进行集团作战的经验有关。究竟事实是怎样的，这个谜尚待解决。

新四军北移出发这条路线，是经12月28日新四军军委会反复讨论决定的，当时确认这条路线是一条较少牺牲的路线，但是1月4日部队出发时遭到了一系列的不幸：一是出发的具体时间是晚上而不是白天，而且又

因连日的大雨，路滑难行，这就给部队行军从一开始带来了困难。二是大部队于5日拂晓到达章家渡时，因青弋江水陡涨，在通过章家渡浮桥时，因过于拥挤，仅过千余人，浮桥即被折断，部队被迫涉水过河，延长了渡河时间，加之由于是隆冬季节，很多人衣服湿透，造成了部队的疲惫。三是由于初出云岭等地不利，部队被迫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加以修整，这样就给了顽军形成紧密包围圈的时间，使北移队伍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未能在合围之前冲出去。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作为全军行动的领导和组织者，在那样的重大行动前没有精心作周密的安排，不作种种的预案，使部队从一开始就陷入行军的困难之中。为什么部队出发不选择在白天？为什么不考虑连日降雨青弋江涨水而采取加固浮桥的措施，成而造成延长渡河时间？为什么一定要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这个谜至今也不见有令人信服的解答。

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时，编队序列为三路纵队，南下茂林时，第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第二纵队为中路纵队，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1941年1月5日，各路纵队先后到达茂林一带。1月6日晨，新四军第二纵队老三团三营派出一个排向高坛方向警戒。7时许遭国民党40师120团搜索部队袭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第一枪打响了。同日下午，新四军军部在茂林潘村的潘家祠堂召开了新四军各路纵队领导干部的军事会议，史称“潘村会议”。会议研究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形成了决定：“以一纵队全部出球岭（注：亦作求岭）；二纵队四个营（注：实为三个营）出丕岭，二个营出博刀岭（注：又名缚刀岭）；三纵队（注：欠五团）出高岭，五团为全军后卫，随二纵队行动。并决定战斗分三个步骤：各部于6日黄

昏开始行动，7日拂晓占领各岭，正午前会攻星潭；攻下星潭后分二路攻三溪四十师师部。”

皖南新四军突围部队会攻星潭有未成功，不仅关系到皖南事变中的一个重要的史实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新四军在事变发生后是否贻误了突出重围的有利时机，更牵涉到项英到底负有多大责任的问题。对此，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断：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没有攻克星潭。其主要理由是，当时突围时机已经丧失，两侧部队未能合围星潭，星潭一带地形不利，突围部队缺乏足够火力，缺乏强大预备队，星潭守敌40师装备精良，文字记录史料中找不到攻克星潭的证据等。泾县党史办曾于1984年和1986年两次召集星潭村了解当时战斗情况的老人座谈，这些老人们回忆新四军确未打进星潭村。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四军部队攻克了星潭，其直接证据是几位新四军老同志的回忆材料，还有时任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少将参谋处长岳星明的谈话材料。这两种观点均言之灼灼，星潭究竟有没有打下，如果没有最确凿的材料发现，这个谜底恐怕已经很难揭开了。

关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突围出来的人数，学术界持论不一。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认为：“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由马洪武、童志强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新四军发展史》认为，“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归队的新四军指战员，总数应为1000人左右。”《皖南1941》（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的作者房列曙认为“新四军突围人数

为 1300 人。”新四军指战员的突围人数，十分精确的数字已经永远是个谜了，但概数究竟是 1000 人左右、1300 人，约 2000 人，还是 2000 余人，尚需学术界继续深入探讨。

日军制造潘家峪惨案

1941 年 1 月 25 日，日本侵略军在冀东地区进行扫荡时，包围了河北省丰润县潘家峪村，集中屠杀村民，焚毁全村房屋，被杀害者 1237 人，烧毁房屋 1000 间。潘家峪位于冀东丰润县城东北 60 里处。惨案发生前全村有 220 户人家，是丰润县联合抗日民主政权的常驻地。1941 年 1 月 25 日拂晓，驻唐山、滦县、迁安、丰润等地的日伪军联合出动，突然包围了潘家峪村。日伪军先是逐户搜查，强迫群众到村西的大坑，然后开始屠杀。当时站在墙上的日军用步枪、机枪对准人群猛烈扫射，并同时放火焚烧老百姓的房屋。宅院中的群众除少数死里逃生外，其余的人全都惨遭杀害。日伪军射击后，仍不死心，又向尸体堆扔手榴弹，炸得尸骨横飞。日伪军还在村内四处搜索，将抓到的群众 32 人在南崖集中杀害，点火焚尸。有 30 多名妇女在白薯窖中被日军奸污后，也惨遭杀害。

潘家峪惨案是在侵华战争中实施“三光政策”的一个具体罪证。

治安强化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和加强在华北的统

治，强迫推行的一种屠杀与怀柔(奴化)相结合的政策和措施。1938年7月，日军华北方面军根据日本大本营关于确保华北占领地区安定的命令，制定了《军占据地区治安肃正纲要》。接着于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进行了三期肃正作战。1941年，华北方面军又把治安肃正扩大为治安强化运动，并于2月制定了《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画》。3月30日，在日军操纵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开始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到1942年底共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日军把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措施。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加强保甲制度，严密施行身分证办法和户口调查，实行连坐法，扩大自卫团、警备队，加强特务活动，以禁绝抗日活动。同时，进行各种欺骗宣传，宣扬“王道乐土”，以强化奴化统治。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恐怖政策与怀柔政策兼施，制造无人区，广修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以推广其占领面，封锁抗日根据地。对“非治安区”则以“扫荡”为主，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军所到之处，人、畜、财、物、田产一扫而光，无一幸免，致使许多村镇成为废墟。日军以极其残酷的破坏，企图动摇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但在八路军和华北人民顽强斗争下，治安强化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

国民党设立上饶集中营

1941年3月，国民党政府在江西上饶建立集中营。

“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集训总队”和“特别训练班”两个单位合并为“中央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由第三战区情报室专员、军统特务张超负责，这一机构便是上饶集中营的对外名称。

上饶集中营由七峰岩、周田村、茅家岭、李村和石塘等5处集中营组成，因都在上饶城附近，所以统称为“上饶集中营”。上饶集中营共囚禁1000余人，其中主要是新四军将士和东南各省被捕的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国民党党政人员中的所谓思想犯，较著名的有叶挺、冯雪峰、林植夫、黄诚、李子芳等。被捕人集中营者，一般先押于七峰岩，然后周田村，最后进入茅家岭。

七峰岩是政治犯软化所，关进这座集中营的犯人一律带脚镣，不许相互谈话，不准看书报，通过个别谈话和强令犯人阅读反动小册子等办法进行政治软化。经过七峰岩的软化阶段，如果还不能达到被囚人自首的目的，就将其转到周田村，使其进入苦役阶段。

周田村集中营是一个苦工营，几百名囚犯被关在有铁丝网的大围墙中，每天都干抬木料、打土墙等苦工。如犯人还不自首，就将其转入茅家岭。茅家岭集中营是杀人屠场，凡是送进这里的人犯，都要被钉上沉重的脚镣，并遭受种种惨绝人寰的野蛮惩罚，纵然不死也奄奄一息。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遇害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皖南事变，以8万军队于1月6日将9000余人新四军包围于安徽泾县的茂林地区。

14日晚，叶挺军长前往敌营谈判，遭到扣留。当晚国民党军队发动总攻，新四军除1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等突围时与大部队失散，只能留在皖南山区，待机北上。在当地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项英等十余人隐蔽在濂坑的石牛坞村后山腰的一个石洞中。

3月23日夜，项英、周子昆与警卫员黄诚住宿于石洞中，其余数人下山与地下党联系转移事宜。副官刘厚总于1941年3月24日凌晨2时用手枪将项英、周子昆打死，黄诚也中弹负伤。刘厚总杀人后劫走项、周携带的黄金、银元、手表、枪枝，逃下山去，投奔国民党县党部报功请赏。

项英、周子昆的遗体被部下发现后掩埋于牺牲处，解放后遗骨移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高会战取得胜利

1941年4月9日，中国军队在江西上高打退了日军进攻，取得了上高会战的胜利，歼日军两万。

这次会战开始于3月15日。华中日军为了确保其南昌占领区的安全，打击国民党第九战区防守赣北的第十九集团军，集中4万余人，在空军的配合下，于4月9日拂晓发动进攻，由南昌、安义等地兵分三路合击上高。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为北路兵团，在飞机和重炮的配合下，于15日攻陷奉新，17日推进到高安，但在国民党第七十二军的逐次抵抗下，伤亡惨重，不得不放弃合击上高的计划，于19日向安义北撤。

日军独立混成二十旅为南路兵团，在16日强渡锦河